

橘

文苑



责编/范亚湘 美编/王斌 校对/谈梁

肆

王森然撰《王湘绮评传》，绘成传主王

闾运的文字素描：“先生丰下而丹颜，目如

电，声如钟，步履如飞，稟赋之厚，盖无与

比。平生早眠早起，无烟酒之嗜，亦摄生之

道有异于人，故其精力弥满，造诣独多。”

民国初年，袁世凯决定聘请康有为担任国史馆馆

长，但康有为力辞不就，还放出狠话来：他要是修《清

史》，袁世凯必入貳臣传。这就让袁世凯如芒在背，浑身

不舒服。于是袁世凯退而求其次，邀请湘绮老人王闾运

出山。早在30年前，王闾运写信给龙高平，就已断言：

“五十之年，仆仆行役，此有官癖者为宜，而以老兄之初

志，又未屑与悠悠者沉浮矣。”莫非到了80岁，他的官

癖反而有增无减？王闾运收到聘书，以嘲弄的语气质疑

道：“瓦岗寨、梁山泊亦欲修史乎？民国才不过两年，何

史之有？唯有馆耳。”但他并未一口回绝，反倒是乐颠颠

地赴京上任。不少学者对此大惑不解，章太炎即致书刘

揆一，笔吐微词：“八十老翁，名实俱至，亢龙有悔，自隳

前功，斯亦可悼惜者也。”清朝遗老郑孝胥的道德优越

感超强，他赋诗嘲讽王闾运，道是“湘水才人老失身”

然而王闾运未在清朝踏入过仕途半步，就连一秒钟的

蓝顶子、红顶子都没有戴过，“失身”之说根本不能成

立。面对郑孝胥射来的毒箭，王闾运以“登西山不用采

薇”作盾牌，巧妙地挡住，意思是，我王某人食周粟，尽

可安心，因为我只是前朝的草民，哪有失节可言？王闾

运去世后，版本学家叶德馨所撰挽联暗含讥刺：“先生

本自有千古，后死微嫌迟五年。”意为王翁若早死五年，

即可名节两全。陈夔龙也对王翁有“倘早没数载，宁非

全福”的慨叹，并且引用查慎行吊钱谦益的诗句“生不

同时嫌我晚，死无遗憾惜公迟”，以增强其言的说服力。

当年，有好事者按捺不住好奇心，揣此疑惑，直接

就教于王翁：“公已八十三岁高龄，夫复何求？如今折身

事袁，为其下流，似不值得。”王闾运的回答既令人解

颐，又令人释疑：“做官是一件最容易不过的事情，如今

老晚，百事莫办，只得找件最容易的事情做做。”

究其实，王闾运受累于弟子杨度，杨度要借重恩师

之盛名，为自己多捞些政治资本，因此擅自在劝进书

上代为签名，实违恩师本愿。在大大非上，王翁的态度

从不含糊，他劝杨度不可犯傻：“若先劝进，则不可

也。何也？总统系统立公仆，不可使仆为帝也。弟足疾

未发否？可以功成身退，奉母南归，使五妹亦一免北楫

之苦乎？抑仍游羿毂耶？”王闾运致书袁世凯，也婉言

劝导这位龙心未饜的大总统打消称帝念头：“……但有其

实，不必其名。四海乐推，曾何加于毫末？”当时，袁世

凯哪里听得进逆耳忠告？

王闾运一生风骨不肯让人，就算他真想兜售帝王

学的“老锅底”，也不至于沿街叫卖。袁世凯得陇望蜀，

欲壑难填，王翁却视之为鄙夫，再加上国史馆的经费、

工资迟迟未能到账，还有寄人篱下、仰人鼻息、“不胜其

辱”之感。愤怒之余，他索性将国史馆馆长的信寄存在

弟子杨度处，未向袁世凯辞行，就一驾风返回南方。

当初，王闾运北上赴任，在武昌题襟会上，意气

洋洋，所作诗句“闲云出岫本无意，为渡重湖一赏春”，

至此仅仅兑现了一小半，折损了一大半，春意似有实

无，秋风萧瑟倒是丝毫不假。

有一则轶事流传至今。王闾运初抵京城，袁世凯示

以高规格的恩宠，不仅陪他游览北海，而且大集百官，

设宴为这位文坛耆宿洗尘。饭罢，袁世凯与王翁聊天，

礼性周至，状极谦卑，王翁则以“慰亭老世侄”称之。返

回客棧的路上，王翁对随行的弟子说：“袁四真是个招

人喜欢的角色啊！”马车经过新华门，他抬头慨叹道：

“为何要题此不祯不祥之名？”同行者大吃一惊，赶紧问

他何出此言。王翁说：“我人老了，眼睛也昏花了，那门

额上头题的不是‘新莽门’吗？”王闾运真够机智俏皮的

，“莽”字与“華”字确实有形相似。西汉末年，王莽发

动宫廷政变，改国号为“新”，猴急鸟躁地过了一把皇帝

瘾。可他惨淡经营的15年短命王朝旋即崩塌，他本人也

被绿林、赤眉推翻在地，好个莽爷成了无头之鬼。王闾

运话中藏话，弦外有音，暗示袁世凯蓄意称帝，其下

场很难过好王莽。

一位阅尽沧桑的大智者，一位被奉为“鲁殿灵光”

的大名士，面对纷至沓来的新生事物，肯定要摆一摆

谱。民国初肇，王闾运曾撰讽刺联一副，“民犹是也，国

犹是也；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横批为“旁观者清”。章

太炎犹未尽，觉得此联与其含蓄，毋宁显豁，他为上、

下联分别添加“何分南北”和“不是东西”（意为民国何

分南北，袁世凯不是东西），将冷嘲变为热骂，愈加痛快

淋漓。时代激变，老派学者与新派学者，名士与斗士竟

有如此之明显的不同，王闾运尚肯预留些余地，章太炎

则连一分一厘的余地都不肯预留。



插画何朝霞

武

王闾运一生的辉煌期在

25岁到55岁之间，暮年做国

史馆长才算一场闹剧。

25岁时，他在秋闱中举人，此后30年间，结交了湘中第一人曾国藩，朝中第一人肃顺和川中第一人丁宝楨。由老同学龙汝霖引荐，王闾运与肃顺结交。肃顺是郑亲王第六子，少年时狎邪无赖，以酒食鹰犬为乐，成人后革面洗心，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肃顺性格强悍，手段狠辣，敢于任事，“积玩之下，振之以猛”，深得咸丰皇帝的信任。他办理戊午科场案，竟置军机大臣、大学士柏葰于死地，刹住了科场舞弊之风。

肃顺延揽精英，广收物望，常说满人糊涂不通，只知道要官要钱，不能为国出力，因此他善待汉人。肃顺爱才若渴，尤其推服楚贤，出手救助过左宗棠，保举过曾国藩，对王闾运亦青眼看重，一度纾贵降尊，要与他换帖，义结金兰。有一次，王闾运为肃顺起草封事，咸丰皇帝读罢，叹赏久之，询问操觚者是谁，肃顺如实相告：“湖南举人王闾运。”皇上又问道：“何不让他做官？”肃顺应答：“此人非要点翰林才肯出仕。”咸丰皇帝闻言，竟有意特加赏貂之厚遇。

王闾运是个明白人，他深知，肃顺处于政争的漩涡中心，发力太猛，树敌太多，自信太过，倘若自己死心塌地投靠他，很可能会沦为鼎鱼幕燕，惨遭斩颈之灾。同时，王闾运接获好友严正基的加急快递，规劝他离开京师，并以严厉的口气发出警告：重蹈柳宗元攀结大臣、急于求进的旧辙，必开招祸之门，因祸而止。严正基言之深切，王闾运悚然动容，便托故前往济南。没过多久，咸丰皇帝在热河驾崩，“祺祥政变”爆发，肃顺被凌迟处死。事发之前，王闾运应肃顺之请，将启程入京，听说顺命八大臣被一网打尽，于是临河而止。日后，他重读好友高心夔寄诗，忆及旧游，百感交集，成古风一首，以示知者。“当时意气论交人，顾我曾为丞相宾。俄罗斯酒味犹在口，几回梦哭春花新！”丞相即肃顺，宾主融洽，一起畅饮洋酒，可见关系密切。

叁

王闾运自道“唐突古人，

自成一派”，自诩“魏晋以后，

都不识圣。圣人大道，自我而

明，如日再中”，自叹“本朝二

百年无著作之手，有一识大思精者闾运者，又不得与承明”。他治学一辈子，著作等身（岳麓书社新近出版了《王闾运全集》），但被人艳称的杰构偏偏只有一部史著——《湘军志》。

咸丰十一年（1861年），郭嵩焘在长沙设立褒忠局，与罗汝怀主持编纂《湖南褒忠录》。同治元年（1862年），郭嵩焘写信给金兰之交曾国藩，商讨体例，曾国藩于三月十一日回信，对此举持保留意见，关键原因在金陵未克。全局仍有可能翻覆，不宜高调鼓吹，以免沦为笑柄。他建议给死事诸公（江忠源、塔齐布、彭泽南、李续宾等人）立传，存其事迹，以免遗忘。将来真正大功告成了，再编纂此书，方可名正言顺，水到渠成。郭嵩焘听了曾国藩的建议，《湖南褒忠录》杀青之后，并未立即付梓。应该说，《湖南褒忠录》是《湘军志》的嚆矢和先声。

同治年间，湘军将领处于高光时期，他们硬生生接下没天文的富贵，被清廷擢拔为总督、巡抚、提督、总兵之类的文武高官，好日子过得快，恍如白驹过隙。曾国藩去世之后，他们这才拍拍后脑勺，猛然察觉当时起兵之人和殉难之士已近乎湮没，传闻失实，功烈无影，若要取信后世，扬名久远，必须勒成一部史书，于是大伙儿决定找一位顶尖高手来修撰湘军史。还有谁比王闾运更有资格接下此单？他是本土大文豪，又与湘军将领多有交集，颇具交情，实属一时无二之勇选，最为重要的，是曾国藩生前就有过“著述当属之王君”的叮嘱。于是经由吴敏树动议，郭嵩焘倡行，曾纪泽主持，赏送了丰厚的润笔（六千两银子）给王闾运。事情就这样敲定下来，时为光绪元年（1875年），王闾运43岁。

肃顺被处死后，人人撇清与他的瓜葛，王闾运却铭记旧恩。主讲船山书院的时候，他含泪对弟子说：“人诋逆臣，我自府主！”意思是，人人都说肃顺是逆臣，我却认定他是府主。同治十年（1871年），王闾运赴京参加会试，回湘之前，还特意探访过肃顺之子承善，暗中以鬻文所获数千金存恤其家，可谓念旧有良心。钱基博夸赞道：“闾运谈谐善谑，独于朋友死生之际，风义不苟如此。”

王闾运精研帝王学，有一个大公案，江湖上盛传他游说过曾国藩，当时曾国藩刚晋升为两江总督，王闾运巴望见到这个局面，于是风尘仆仆赶到安徽祁门湘军大本营。王与曾私下里的密谈内容如何？已成千古之谜，后人不得而知。《湘绮楼日记》起始于同治八年（1869年），此前的线索已无从寻踪。但细查曾国藩从咸丰十年（1860年）六月初十到八月十八日的日记，尚可寻获蛛丝马迹。在这70天中，曾国藩与王闾运有多达14次“久谈”，其中七月十六日一则：“傍夕与王王久谈，夜不成寐。”而到了八月中旬，曾国藩收到弟弟曾国荃和湘军将领李元度的来信，提醒他“文人好为大言，毫无实用者，戒其勿近”。若只是寻常的聊天，曾国藩何至于通宵失眠？曾国荃等亲友又何至于紧张兮兮？

王闾运试图说服手握重兵的曾国藩弃寇自用，不急于攻打太平军，将天下大局逐渐导向三足鼎立之势。满清王朝根基已朽，太平天国内耗严重，湘军势力则如日方中，坐观成败，徐图进取，整顿全局；江山即可重回汉家。对于王闾运所陈献的大计，曾国藩不可能不动心，但他是多病之身，况且长期浸淫于宋明理学，臣忠子孝的思想骨髓，人生几何，以多病之躯去触发身败名裂的风险，值得吗？

事隔多年，王闾运告诉自己的门生、杨度的胞弟杨钧，他与曾国藩私下议事时曾进言：“大帅功高望重，将士用命，何不乘机夺取江山……何苦白白替别人出力？”后者伏案，一边听他侃侃而谈，一边用笔写着东西。中途，曾国藩外出了一阵子。王闾运起身走到案前察看，结果发现曾大帅满纸全

古代的史官原本分为左史和右史两类，二者分工明确：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譬如《尚书》记言，《春秋》记事。太史公著《史记》，将言与事合而为一，从此创下新例。

王闾运目高于顶，在他看来，唐宋八大家只不过是泛泛之辈，“八家之文，数月可似”，将牛皮直接吹成了虎皮。他发足狂奔，为的是“依经立干”“力追班马”，直接取法班固和司马迁，“为有德之言”。细读《湘绮楼日记》，同治八年（1869年）二月初一，王闾运阅读《三国志》两卷，认为它“诚非佳史”，陈寿的史才被后世夸大了。他写道：“史才不易，亦何容滥予人名，若以鄙人秉笔为之，当不在范、班之间，因慨叹久之。”王闾运对自己的史才极为自信，不仅能够盖过陈寿，还可直追《汉书》的作者班固和《汉书》的作者班固。

当年，尚在搜集资料阶段，王闾运写信给刘坤一，阐明《湘军志》旨趣：“其意不在表武功，而在叙治乱得失之由。”这无疑与湘军集团功勋老人们的初衷背道而驰了。王闾运拿定主意，“私论官书均当兼采”，花费5年工夫，写成《湘军志》，总计16篇，10万余字。光绪四年（1878年），王闾运在日记中写道：“作《湘军志》，因看前所作者，甚为得意，居然似史公矣，不自料能至此，亦未知有赏音否。”太史公司马迁是中国史学界两千多年来的头号标杆，王闾运富有文才，若论体大思精，何能望其项背？然而所谓的名山事业，若非自信满满，必定难以以为继。

《湘军志》杀青后，王闾运感慨系之：“修史难，不同时，失实；同时，循循。”（《史官》）无故而持大权，制人命，愈称职愈遭忌也。”“史官之笔就像阎罗殿上的判官之笔，轻重缓急之际，既可使对方一举超升，也可使对方万劫不复。何况他并非史官，却酷评诸多宿将，活着的人难免深受伤害。倘若他情商够高，笔头子够圆，以歌功颂德为能事，就不难结交于衮衮诸公。可是王闾运又

写“妄”“谬”二字。待曾国藩返回，王闾运便转移话题，谈笑如故，不复陈谈大略。

杨度作《湖南少年歌》，述及恩师王闾运的遭遇：“更有湘潭王先生，少年击剑学纵横。游说诸侯成割据，东南带甲为连衡。曾胡却顾咸相谢，先生笑起披衣下。”这也间接证实了王闾运游说过曾国藩和胡林翼。

王闾运空怀帝王学和纵横术，未能施售其万一，徒然感叹“贤豪尽无命，天意恐难凭”，道在身将老，名轻愿不刊”。王闾运的大计落空是必然的，曾国藩老谋深算，清王朝大厦未至，他只能避祸求福，顺势而为。

《清史稿》王闾运本传云：“闾运自负奇才，所如多不合。乃退息无复用世之志，惟出所学以教后进……成材甚众。”身为满腹经纶的纵横家，王闾运长期走背运，的确很不行时；身为广树人才的教育家，王闾运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仅川、湘两地，出自其门下的高足弟子就有廖平、岳森、杨锐、杨度、杨钧、胡从先、宋育仁、刘光第，他有教无类，木匠齐白石、铜匠曾昭吉、铁匠张正珩受其点拨，皆卓然成才，荣获“王门三匠”之美誉，尤其令人称道。从这张简约的人才清单，我们不难看出，“戊戌六君子”中有两人（杨锐和刘光第）曾列于王氏门墙，这绝非偶然现象。王闾运能将天下豪杰收为弟子，光勉强是不行的，还得确有超过他人的真功夫，硬本领才行。王闾运赠诗王森然：“求友须交真国士，途经还作济时人。”他治学以社稷苍生为念，以经世济世为怀，从不赞成门下弟子一味埋首于故纸堆中，纯然以训诂考订、章句摘句为能事。

王闾运未能乘时一展，始终耿耿于怀。他致书好友李榕，就曾一吐为快：“要之我辈各放光明，必非太平气象，不如林泉啸傲，皮口喧天，既保交情，更全国体。此外蝇营狗苟，相党相争，或汉奸以保功名，或清流而取将相，既非吾人所屑，宜其升官而发财。举人有人举乎？废员当废然也。”真要是心平气和，淡定如砥，他就不会发这类牢骚了。

不容情，在他的笔下，朝廷的官吏昏庸无能，湘军的将领贪残成性。大将曾国荃和刘坤一，前者无异于市中之屠夫，后者仿佛是乡间之笨伯。大佬们恼羞成怒，纷纷跺脚黑脸，指斥《湘军志》诬枉奸佞。多年后，湖南巡抚陈宝箴盛赞《湘军志》，竟也怀疑王闾运纯粹以个人爱憎驱遣笔墨。殊不知，王闾运认定“怀私文必不能工”，他是秉持公心才敢开罪大佬强梁。

事情越闹越高调，那些原本狂恣跋扈的老帅老将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要给王闾运一点利害瞧瞧。曾国荃尤其恼火，金陵决战明明是他戎马生涯中的头号亮点，王闾运却轻描淡写，把众志成城、太平军描写成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使其军功大为减色。曾国荃的门人“怒于市而色于室”，怒骂王闾运笔下专揭九帅的疮疤，专寻九帅的晦气，专跟九帅过不去。他们甚至准备捋袖动粗，大有暴打王先生一顿而后快的意思。其实，王闾运笔下已为曾国藩开脱不少，并未赶尽杀绝，既然曾老九不领情，王闾运也只能摇头叹息：“不知文之人，殊不可与言文！”他致书亲家黄子寿，摆下这段话：“申夫（李榕）之恨《湘军志》，较沅甫（曾国荃）尤甚。闾运书云：‘他日闾王殿下，亦惟有俯伏认罪，自投油锅，不知可平旦夕之气否？’”

因为《湘军志》一书，王闾运名满天下，谤亦随之，这回连老朋友郭嵩焘也抹下面子，不更同情其遭遇：“王千秋《湘军志》，均取当时官场谣诼诬讪之辞，著为实录，以相印证，尽取湘人有功绩者诬蔑之，取快悠悠之口，而伤忠烈烈士之心，竟莫测其用意之所在。其颠倒功过是非，任意低昂，则犹文人习气。”王闾运不胜其烦，不堪其扰，只好妥协，将《湘军志》的雕版和部分成书交给郭嵩焘（因为郭氏是湘绅宿望，又很反感《湘军志》），任其毁弃。可是王闾运的蜀中弟子不畏强权，硬是将这部史志刻印出来，使它流播于坊间，蔚存于世上。

壹

当然是据说，王闾运诞生的前夕，其父梦见院门上乍现“天开文运”四个金光熠熠的大字，灵机一触即发，他为儿子取名“闾运”，宛如天赐祥名。

年轻时，湘潭才子王闾运丰神秀隽，堪称“情种”。“昔年十八九时，在长沙与左氏女相爱，欲娶之。左女亦誓非我不嫁，乃格于其母，不得，左女抑郁以死。”王闾运为左氏女赋诗《忆梅曲》《紫芝歌》，还为她撰写过悱恻的《吊旧赋》和绮艳的《采芬女子墓志铭》。左采芬是美貌的花骨朵儿，“雪肌以杨柳为腰，玉色以芙蓉作骨”；难得的是，她知书达礼，会弹琴吟诗。爱情遭受外力阻碍而不幸消歇，这番经历令人刻骨铭心，直到暮年，王闾运仍然缅怀初恋女友，情根深植，伐柯之斧也莫奈它何。

王闾运的妻子是其塾师蔡先生的女儿。王公子尚未娶，蔡小姐先自属意，老祖母主动出面探东风，于闲谈中貌似随意扯出话头：“湘潭的王生，文才人品蛮好，只可惜太穷了些。”孙女低头笑道：“少年穷措很正常，出息总在日后。”老祖母见她心有所属，赶紧就汤下面：“那你不愿意嫁给这位穷秀才？”孙女两颊绯红，低头微笑不语。女郎开心，家人不反对，一桩共谐连理的美事便轻松玉成。蔡小姐名菊生，从小识字，能背诵《楚辞》，有咏絮之才。订婚当晚，王闾运梦见庚帖上写着一个醒目的“媿”字。婚后，他以“梦媿”作为蔡夫人的别字，又添加了一把固结夫妻感情的黄铜锁。婚后10年，王闾运远在外地，写信给蔡夫人，依旧一往情深：“分无壺公缩地之术，而有景纯愿夏之心，岁月将驰，优游而已。子吟桂树，我咏松枝。既见不暇，方谋同老。”他写家书也喜欢搬弄典故，文人的积习太深。

民国时期，名士孙思昉写信给掌家徐一士，对王闾运有赞有弹，其中一段话妙趣横生：“王翁本不满宋学，其识议能轶出宋人上，而行亦多可议。蜀人士谓蜀学由王翁开通，然从学者或得其遗风……”名师出高徒，并非非常。人性是天足，道德是鞋，削足适履，绝非王闾运所乐为。徐一士评议道：“王氏不受宋儒矜束，非不高明，特所以自律者不甚讲求，小德出入，浸或逾闲，一代经师，而人师之道乃不免有阙焉。”王翁很少遮掩行迹，也不伪装圣贤，这就将撒谎精康有为甩开了十二条大街。

王闾运平素特别讨厌那些束身害性的陋儒，曾作《拟曹子桓》一诗，诗中有句：“高文一何绮，小儒安足为！”好一个“绮”字，这是王闾运极高的自许。曹子桓即魏文帝曹丕，若论文学才华，可算是历代帝王中的前十名高手，此人另有出奇的地方，竟然将文章视为世间的宝中之宝，重中之重，其《典论·论文》既动情又认真：“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中年后，王闾运在今长沙营盘路购置一座小楼，题为“湘绮楼”。他自封为“湘绮楼主”，属意于名山事业，其初衷昭昭见诸天日，被小人儒们诟病为风流率性，他是毫不在意的。

同治三年（1864年）王闾运最后一次赴闱，即将行至清苑，忽然思念起“洞房云阁临朝阳”的湘绮楼，心中突生对科举的厌恶，遂改轸而归，作《思归引》以明所怀曰：“思归引，悲朔方，长风驱雁雁南翔。眷伦匹，怀江湖，假余翼，谓渭河无梁……”从此，王闾运绝意仕途，在湘绮楼过着半隐居式的著述生活。今年10月最新出版的《王闾运全集》达38册，1240万字。

名士湘绮

王开林

文脉长沙

